

# 让远程医疗服务释放更多能量

本报评论员 吴迪

不到10例,超八成远程医疗设备闲置。远程医疗可以降低运送病人的时间和成本,使医生突破地理限制开展会诊,给出更精准的治疗方案,还可以科学地管理和分配紧急医疗服务等。事实上,5G技术赋能,发展远程医疗是大势所趋,意义深远。它既有助于优化转诊模式,缓解医院医疗资源的浪费,也可以减轻患者经济负担,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,同时对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、促进医学交流也具有积极意义。特别是在各地不断推进“互联网+医疗”布局的背景下,包括远程医疗在内,基于AI技术的辅助医疗手段、智慧急救平台等,都已经成为“智慧医疗”发展大趋势上的生动注脚。比如,今年3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——海南的神经外科专家通过高清画面远程操控手术器械,为北京患者实施了帕金森病“脑起搏

器”植入手术。但远程医疗在现阶段面临不少困境。比如,本应成为远程医疗救助中坚力量的年轻医师尚未充分参与进来;基层医院的网络条件参差不齐,远程图像传输不清;基层远程医疗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没有打通;患者的认同感不强等。“超八成远程医疗设备闲置”就好比远程医疗的技术已经准备起跑了,但实际应用的鞋子“不跟脚”,还是跑不起来。远程医疗出现“卡顿”,与多方面因素相关。在政策上,收费标准、是否纳入医保等尚无明确说法,对优质医疗队伍投入远程医疗的引导不足;在技术和设备上,可能会因网络和软硬件设备故障而出现画面扭曲或器械操作偏差;在心理上,患者对远程会诊的信任度较低,毕竟隔着屏幕不如与医生面对面更放心;在资金上,各级医疗机构的经费支撑不同,设备维护、人员配备、

网络资费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存在力不从心的问题。破解远程医疗“雷声大雨点小”的尴尬,首先要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上发力。目前,《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《关于完善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见》《基于5G技术的医院网络建设标准》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,为远程医疗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基础,但还需在体制机制上打通关节,出台更加具体、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标准规范。如医院如何规范管理医护人员并调动其参与远程医疗的积极性,第三方利益如何划分,等等。此外,在技术上,建立专业的远程医疗系统,畅通医院内外网互联互通;进一步推广医学人工智能监测辅助诊疗系统,让患者感知到科技的温度和远程医疗的“能量”。在服务上,通过远程跟踪诊疗、远程送药等服务,让百姓就近获得优质的

智慧医疗服务。技术若被束之高阁,就失去了技术本身的价值。早一天布局、覆盖和应用远程医疗技术,打通技术与应用之间的关节,患者就能早一日分享到医疗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红利、享受到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服务。让远程医疗服务放大优质医疗的效能,扩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覆盖面,满足人民群众更高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,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探索和努力。一个一步步补齐短板,整体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医疗新格局,正在为更多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。



扫描二维码“钟鼓声”看工人日报“钟鼓君”评论。

## 识别诈骗电话,当心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

史洪举

据澎湃新闻报道,9月6日,公安部新闻中心发布消息称,四川江油一女民警对辖区实有人口进行核查过程中,平均日拨100余个电话,电信运营商识别其拨号频率太高,以“涉嫌电信网络诈骗”为由将其停机。目前,四川电信表示这其实是正常履职,在了解情况后进行了核实,并为该民警的手机复机。

这是一场“美丽的误会”,电信部门针对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,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识别和攻势是应有之举,偏巧就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,不小心误伤“友军”。

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异常电话并对其及时关停,有着现实意义。毕竟正常情况下,普通用户不太可能有如此高的主叫需求。但要考虑到通过“拨打频次”识别诈骗电话极易误伤无辜,尤其是对一些公共服务电话进行停机或作出“诈骗”“骚扰”等标记,更会耽搁正事。比如,民警、快递员、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等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高频拨打电话,要是不加甄别地将其作为诈骗电话而停机,无疑是好心办了坏事。

因而,仅将拨打频次过高视为诈骗电话进而停机的做法,是对大数据技术的偏离。针对诈骗电话拨打频次大、利用非实名电话

或改号软件进行呼叫的诸多特点,应不断完善大数据技术,收集更多更广的信息并综合分析,让大数据技术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更加精准。

此外,打击电信诈骗,务必要求电信及金融机构全面、严格地落实实名制。而且应做到人证合一,对照登记,即对开户者与所持证照严格核查并拍照留档,防止一些人持他人身份证冒名办理业务,让实名制流于形式。还应采取有效措施阻断改号软件网上发布、搜索、传播、销售渠道;严禁违法网络改号电话的运行、经营;确保来电显示的真实有效,切实识别、拦截异常号码。

精准识别诈骗电话,还可以尝试以身份证号码为基础设立黑白名单制度。对于快递员、公共服务电话等通话频次较高的电话,在实名认证基础上为其开立“白名单”并作相应标记且加以“锁定”。同时,结合其他特征,筛查到诈骗电话后可采取复核程序,经确认系骚扰、诈骗电话的予以停机。这样方能让技术运用和大数据分析用到刀刃上,精准识别诈骗电话且有效避免误伤及“友军”。

总之,确保每一串号码的背后,都是经过认证的真实的人和单位,并能够有效溯源,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公众少受诈骗侵害。充分利用大数据,仍有很多空间可以开掘。



### 冤枉路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,近日一位广州市民驾车到机场接人,绕了三圈也没有找到路,还吃了一张罚单,后来才知道私家车通道封闭,必须步行通过。在处理罚单时,各种官方消息“打架”,一会儿说去窗口处理,一会儿又说罚单已经放权,可在市区寻找终端机处理,令当事人一头雾水。

这条新闻看得令人心塞。现实中,很多人有过类似遭遇。道路交通信息不明,处理违章渠道不畅,很多时候是信息发布不及时、通达效果不佳,以及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出了问题导致的。拿封路信息来说,只把通知投放在机场电子广告屏滚动播出,有多少人能关注到?通知没有通达,就失去了其意义。公共治理也是一样,便民措施不便民,智能服务不智能,往往会让百姓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事。用心服务,不见得有多难,有时候多发布几条温馨提示就够了。

李法明/图 嘉潮/文



## 给“注水剧”挤水分,限制集数只是手段之一

木须虫

针对目前国产剧“注水”严重的问题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研究相关应对措施并向行业征求意见,拟规定剧集上限集数为40集。有数家影视剧制作公司人士证实,这一新规正在调研中。(见9月8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观众吐槽“注水剧”久矣,有必要给剧集挤挤水分。然而,如何定义“注水剧”,很难有统一的标准,这就给“挤水”带来基础性的障

碍——集数多与少只是外在,重点还是看内容,例如若以40集为上限,25集的剧本拍成40集,就不算“注水”吗?另外,一些公认的国剧经典很多都超过40集,算是“注水”吗?从提高电视剧制作质量来说,控制剧集集数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,但不意味着没有作用。国内电视剧越抻越长,根源在于制作生产与消费模式。生产方受制于买家或播放平台对压低成本的诉求,剧作越长单集成本就越低,对应的播放平台在相同的周期内,制作或者采购剧作的支出就越低,剧集长还

会拉广告收益。于是,“质量服从时长”成了行业内的潜规则。从行业生产标准的角度来看,有一个大概合理的剧集数参考标准,往往比放飞自我的野蛮生长要合理。如同电影一样,时长不是绝对的,但有一个基本的参照标准,在弹性的范围内自主调节。找到剧集时长相对公允的标准,其意义同样在这里。一是让剧作按标准来生产,二是防止剧作过度冗长、质量缩水。限制剧集更大的作用还在于为剧作生产

新中国成立初期,毛泽东提出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的外交方针,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。朝鲜停战以后,国际局势有所缓和,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。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,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。

1954年4月至7月,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。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,经过多方努力,会议达成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》,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。会场之外,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和各方面人士接触,他真诚、坦率、

## 登上国际舞台

机智和潇洒的个人魅力,给人们特别是没有和新中国接触过、原来心存疑虑的人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休会期间,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,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,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其基本内容是: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、和平共处。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。

1955年4月,周恩来再次率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。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,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产主义。针对此,周恩来在发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:“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。”“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。”会上的紧张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变。会议最终达成《亚非会议最后公报》,提出关于促

### 浙江:“最多跑一次”跑出改革加速度

的手续。”杭氧集团负责保障工作的工会干事简群告告诉记者,“现在新员工自己手机上就能操作,老员工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也能顺利完成申报,再也不用在两地之间赶来赶去了。”

#### 改革朝着纵深方向发展

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,浙江并未停下脚步。在不断加速推进规范化、标准化的同时,也在不断朝着纵深方向发展。

今年初,为了依法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,优化营商环境,浙江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办公室公布了“最多跑一次”“一件事”目录。

此次公布的目录共47件,包括外贸企业证照联办、餐饮服务证照联办、住宿服务(暂不含民宿、农家乐)证照联办、商场超市证照联办、娱乐场所证照联办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核发、临时用地审批等等。

与此同时,“最多跑一次”也“跑”进了机关内部。今年4月,浙江全省召开机关内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专题会议,专题研究机关内部如何开展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。

浙江省委编办会同省委改革办,组织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发改委、省财政厅等16个省级部门开展机关内部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试点。截至7月底,梳理出的358项办事事项中,“最多跑一次”实

近几年,在喀什地区组织部及喀什电信党委的领导下,依托喀什地区援疆资金、人才、技术优势,他积极配合、提供技术方案,通过与组织部门人员协同构建了融党员教育互联网教学平台、党建网站、党员手机报、党员干部信息服务体系等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,实现一个中心平台与12个县级教育中心、172个乡镇(场)站点和2476个村级教学点18万余名基层党员联通共享。目前,该“互联网+党员远程教育”信息化项目已经成为全疆党员教育互联网信息化项目标杆。

#### 帮扶无缝隙,关怀无空白

买吾兰江生活工作的喀什地处南疆,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。在自然环境恶劣、脱贫

任务繁重、维稳压力巨大的边城工作,要付出多出常人几倍的艰辛。买吾兰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,父母从事教育工作。从他出生起,就和汉族同胞朝夕相处,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。不管哪个民族的同事遇到困难,他总是倾囊相助。帮扶无缝隙,关怀无空白。帮扶亲戚家遇到了困难,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帮扶亲戚身边,为他们排忧解难。指导帮扶亲戚发展“庭院经济”,推进“改厕改厨”,倡导“三新活动”……

买吾兰江的扶贫对象在距喀什市300公里外的莎车县夜孜甫夏提塔吉克族乡兰干村。不管工作再忙,他始终牵挂着扶贫对象多来提·胡拉麦提和阿卜杜喀依木·喀迪尔两

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,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。

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、友谊、合作的“万隆精神”,掀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、反对殖民主义历史书的一页,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朋友。

(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)



### 新中国峥嵘岁月

现率达到75%,网上开通率达到57%。

有试点单位负责人表示,“开展这项改革,就是要自我加压,主动与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作斗争,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能腾出手来,更好为群众企业服务。”据介绍,这次改革将省市县3个层级的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、纪委监委、法院、检察机关以及群团组织机构均纳入实施范围,“‘最多跑一次’改革没有局外人”。

根据目标要求,到今年底,浙江省80%以上部门间办事事项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,其中年办件量100件以上和本部门办件量排名前五的事项100%实现“最多跑一次”,60%以上部门间非涉密办事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功能,部门之间一般性文件会签的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,力争办事材料精简30%以上,办事时间压减40%以上。

家人的冷漠。

在一次走访中,买吾兰江发现多来提·胡拉麦提没有搬进安居富民房,每天寄居在邻居家,晚上围着火炉谈心时得知,多来提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装修房屋和购置生活用品,买吾兰江便借给多来提5000元现金,正是这份无私的帮助,让多来提高高兴兴地搬进了安居房。

每次去帮扶亲戚家,买吾兰江都会大包小包带上日用品、蔬菜。白天帮亲戚干活忙碌,晚上为亲戚宣讲党的惠民政策,鼓励亲戚勤劳致富,不忘感恩。

没有惊天动地的工作作风、优质的技术服务支撑,严谨的工作态度及过硬的业务技能,买吾兰江赢得了身边人的好口碑。

## 公安部:购车上牌可在车辆销售企业一站办结

本报北京9月10日电 (记者卢越)记者今天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,公安部推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的交管6项新措施,包括3项便捷快办服务和3项网上交管服务。新措施将于9月20日起推行。

据介绍,3项便捷快办服务包括车辆登记销售企业快捷代办,提供购买车辆、购置保险、选号登记等全流程服务,变多头奔波为在销售企业一站办结。一是实行销售前车辆预查验、资料预审核,信息预录入,最大限度压缩群众办事等待时间;二是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,承租人可以通“交管12123”APP网上查询、自助处理租赁汽车交通违法,免去多地奔波;三是临时入境车辆牌证便捷可办,简化

申领手续,延长使用期限,推进临时入境牌证业务向边境口岸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地延伸,便利临时入境人员车辆出行。

3项网上交管服务中,一是全面推进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,非营运小客车异地转籍的,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地申请,不再需要到迁出地车管所提档、验车;二是全面推行“两个教育”网上学习,实行驾驶人审验教育和满分教育网上申请、网上认证、网上学习;三是全面推行交通事故多发点段网上导航提示,提供交通事故多发点段、占路施工、交通管制、交管业务网点等信息导航提示服务。9月20日起,具备条件的地方率先推行,年底前全国推行。

### 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

## 罗健夫:知识分子的楷模

据新华社长沙9月10日电 (记者师才)罗健夫,1935年9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城关镇南正街。1948年考入湘乡一中。1950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。

1959年4月14日,罗健夫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大学毕业后,先后在西北大学、中国科学院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、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(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)工作。

1965年,罗健夫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。1968年,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。次年,主持国防航空项目——图形发生器攻关。“文革”期间,他力排干扰,以顽强的毅力,攻读电子线路、自动控制、精密机械、应用数学、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,并在短时间内掌握了第二外语。有时,他整日不出工作室,饿了啃块馒头,困了就躺在地板打个盹。1972年,他研制出了第一台图形发生器。1975年,他又研制成功了“Ⅱ型图形发生器”,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78年,“Ⅱ型图形发生器”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。面对荣誉和奖励,罗健夫想得

提供更多的环境。据广电总局备案公示,2019年6月,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58部、2002集,平均每部34.5集,而去年同期平均每部39.7集,平均每部减少5集。按此数据,在电视台栏目播放时间不变的情况下,意味着可以增加超10%新增剧目播出的机会,如果将剧集集数限得更低,这个比例会更高。显然,这有利于引导剧作生产走出跟风、效仿、同质化恶性竞争的窠臼,多一些原创佳剧的播放空间。

剧作的质量高不高,观众最有发言权。问题是在现行的生产与播出机制下,观众几乎没有发言权。从长远来看,如何把观众对剧作“用遥控器投票”与剧作的生产与交易挂钩起来,才可能真正形成提高剧作质量的内生动力。这显然还有待行业市场的渐进改革。

最多的其他同志。在Ⅱ型图形发生器申报国家科技成果时,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最后。他对职务、名利看得很淡,甘愿当“普通一兵”,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。1980年和1981年两次评定高级职称时,他都没有申报,认为自己的水平还不够。“Ⅱ型图形发生器”研制成功后,他再接再厉,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,至1981年10月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设计。

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,病魔却悄然向他袭来。一次调试设备时,他突然病倒。1982年2月,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。面对沉重的打击,他想得最多的仍然是手头的科研工作不能停,为此,他请求医生不要将病情告诉家人。面对绝症,他看得开,不止一次对主治医生说:“死后我的身体捐献给国家,你们可以解剖好分析一下,希望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。”

罗健夫去世时年仅47岁。1983年2月,他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。2007年是罗健夫逝世25周年,771研究所为他塑像,号召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学习罗健夫忘我工作、勇于攻关的精神。